

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

薛 暮 桥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着大半个中国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退缩到西南大后方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挺进到敌人的后方，建立了若干块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。这种军事上的三角斗争，同时也形成了抗币（抗日民主政府所发行的货币）、法币（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货币）和伪币（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汉奸伪政府所发行的货币）的三角斗争。

敌我货币斗争的胜负，从根本上说是决定于敌我军事上、政治上的斗争的胜负，是敌我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斗争之一组成部分。但是，货币斗争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，有在总路线、总政策指导下的特殊政策。货币斗争的胜负，对军事、政治斗争的胜负也起一定的作用。这个时期由于货币斗争十分复杂，十分尖锐，情况瞬息万变，我们在斗争中是否掌握客观规律，是否掌握正确的政策，往往很快地决定斗争的胜负。如果在有利形势下我们掌握不好，可能招致失败。反之，如果在不利形势下掌握得好，也有可能取得胜利。回忆这一时期山东根据地的斗争经验，加以科学总结，对于正确认识货币的规律，决定今天我们的货币政策，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。

（一）敌我货币斗争的经过情况

抗日战争时期的敌我货币斗争，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，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吸收法币，用于换取美元、英镑，所以，法币在解放区和敌占区都自由流通，币值比较稳定（徐徐下降），斗争还不那么尖锐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用法币换取美元、英镑已不可能，日本向我们解放区猛烈排挤法币，法币迅速贬值，斗争突然激烈起来。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，伪币退出历史舞台，抗币和法币继续进行斗争，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。这里讲的仅仅是后一时期，即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的胜利，特别是1943到1945年。

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广大地区以后，他们就在敌占区强迫使用日币。在汉奸伪政权建立起来以后，又开始发行伪币（在华北是“联银券”，在华东、华中是“贮备券”）。但是，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以前，法币在敌占区市场仍占优势地位。当时法币在美英等国家的帮助下，币值没有猛烈下降。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币，收兑法币，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（美元和英镑），向国际市场上套购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。因此，仍让法币自由流通，并不希望法币迅速贬值。

这时在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市场上，法币也占优势地位，禁止伪币流通。当时有些根据地已经开始发行抗币，但因法币能在全国自由流通，所以我们常使抗币同法币共同流通，保持固定的比价。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，用来保证抗币币值的相对的稳定。这样的货币政策，同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是大体上适应的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日本从上海等地攫取到几十亿元法币，同时没收这些地区的美英等国的银行，这样用法币来换取美元英镑的桥梁也因此断绝了。他们就从利用法币，转而驱逐法币，把几十亿元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我们敌后根据地，用来攫取大量的物资。同时大量发行伪币来代替法币，以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。因此，法币就迅速跌价。谁贮存着法币，谁就担负法币跌价所造成的损失。但是，由于国民党政府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，法币的价格还是时而跌落，时而比较稳定。而且由于日本滥发伪币，伪币的币值从1944年起猛烈下降，有时跌落得比法币更加迅速。

日本排挤法币和法币迅速贬值，对当时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巨大的威胁。1942年从四周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，与此同时就有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出境外，被敌伪掠夺。而且由于法币不断贬值，使掌握法币的根据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抗日民主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，排挤法币，禁用伪币，大量发行抗币，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。

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，必须迅速排挤以至完全停用法币。因为当时根据地市场上法币的流通数量已经超过市场流通需要，而且还在源源流入，不排挤法币，就不可能腾出市场来发行抗币。有一时期（1942年）我们仍让法币在市场自由流通，同时用主观主义办法宣布法币贬值，银行挂牌提高抗币对法币的比价。但因这时货币的流通总量已经超过市场需要，抗币的比价事实上提不起来，抗币的币值还是跟着法币一起跌落。只有坚决驱逐法币，让抗币独占根据地市场，同时适当掌握抗币的发行数量，大体上符合市场流通需要，才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，并随着法币的跌价而使法币对抗币的比价相应地跌落下去。

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，1942年在胶东北海地区开始取得胜利（所以后来全省抗币都称“北海银行”货币），1943年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取得胜利。由于我们把几亿元法币逐出根据地市场，换回了大量的物资，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，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抗币，基本上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。1943年夏季当我们在全省范围开始排挤法币时，抗币的币值同法币相等。到这一年冬天，抗币同法币的比价就变为一比六。根据地的物价基本稳定，在开始停用法币时，由于抗币的发行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要，物价还曾经暂时下落。对敌货币斗争的这一巨大胜利，大大地提高了抗币在人民中的信仰，使我们在击败法币以后能够进一步击败伪币。1944年不但法币继续跌价，伪币的币值也迅速跌落，它对抗币的比价从1元伪币兑抗币1.5元（1944年1月）跌落到0.15元（1945年1月）。因此，在根据地市场上，法币伪币完全绝迹，许多游击区也变成抗币的市场，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乐于接受抗币，以便随时购买我们根据地的各种物资。
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，敌后根据地法币的比价突然上升，伪币的比价突然下降。但是，由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阻止日本军队向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，日本军队为准备逃跑，抛售他们所掌握的大量物资，敌区物价突然下落，伪币突然涨价。抗日民主政府利用时机在新解放区大量发行抗币，驱逐伪币，把它送到敌占区去换回大量物资。由于我们及时行动，把几十亿元伪币从新解放区迅速排挤出去，使新解放区人民在不久伪币跌成废纸时，没有受到损失。

（二）对敌货币斗争中的方针政策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取得光辉胜利，连日本和许多外国朋友也感到惊奇。但是，我们胜利的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。现在把当

时曾有争论或者曾经犯过错误的几个问题，提出来供大家研究。

第一，排挤法币伪币，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，是取得货币斗争胜利的主要关键。在当时具体条件下，我们是否有可能驱逐法币，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？有些同志对于这点信心不足，他们认为抗币没有金银贮备，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的支持，如果脱离法币，它的币值就没有保证，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。由于存在这样的思想，所以有些地区不敢驱逐法币，让法币继续盘踞根据地的市场，和抗币按固定比价共同流通。个别地区在停用法币以后，仍然把银行收兑的大量法币贮存起来，企图用它来作抗币的保证。结果由于法币迅速跌价，使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。

经验证明，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，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不但十分必要，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。首先由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，抗日战争节节胜利，根据地逐步扩大，广大军民有最后胜利的信心。其次，山东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，农业生产连年丰收，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等都能够自给，有些地区还有多余可以输出。最后，山东海岸线长，产盐十分丰富，津浦、胶济铁路两侧和路西有一千多万日本人和敌区人民要吃我们的盐，抗日民主政府实行食盐专卖，提高出口盐价，不但造成对敌贸易的出超，而且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援抗日战争。具备了这样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，只要我们认识经济斗争的客观规律，掌握正确的方针政策，就完全可以取得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。

但是，假使我们不坚决排挤法币，打击伪币，某些有利条件也有可能转化为不利条件。如前所述，大量食盐输出是山东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很有利的条件，抗日民主政府利用输出食盐所取得的大量法币伪币，不但从敌区换回我们所必需的各种物资，而且用来压低法币和伪币的比价。当时有些地区也有大量食盐输出，而且还输出一部分粮食和棉花等产品，贸易出超更大。但因他们没有坚决停用法币，大量物资的输出却引来大量法币的输入，使根据地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政府和人民都受到巨大的损失。

第二，当时根据地的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资产阶级“拜金主义”思想影响，认为金银是纸币的不可缺少的保证。如果没有金银，就必须用“金本位”的美元、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。既无金银又无外汇，我们的抗币就是空中楼阁，没有基础，无法保持稳定。几年来敌后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掌握的粮食、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，不需要依靠黄金。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，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，而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、棉布等日用必需品。马克思说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。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，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。只要我们适当控制抗币的发行数量，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，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，平抑物价，就完全可以使抗币在人民中建立巩固的信任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到山东解放区来访问，他看到抗币没有法定含金量，没有金银贮备，也得不到美元、英镑的支持，但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，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奇迹。他问抗币定为什么“本位”？我答复我们采取的是“物资本位”。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，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。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，至少有五千元用来购存粮食、棉花、棉布、花生等重要物资。如果物价上升，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，平抑物价。反之，如果物价下降，我们就增发货币，收购物资。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，比饥不能食、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。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，他们不要黄金，更不要美元和英镑。

第三，我们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，是巩固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，稳定根据地的物价，藉以保障生产发展，安定人民生活，而不是压低法币伪币的比价。有些同志把压低法币伪币的比价作为我们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，把法币伪币的比价压得愈低愈好，这个思想是错误的。抗日战争时期法币伪币都在广大范围流通，而我们的抗币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，只能分区发行，流通范围很小（当时山东根据地只有一千多万人口，还被胶济铁路、渤海湾和几条公路隔成五个地区，分区发行货币。后来胶济路南三个地区联成一片，仍有三个地区）。这时法币伪币纷纷跌价，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滥发纸币，国民党大后方和敌占区的物价猛烈上涨。我们货币斗争的胜利，对法币伪币的贬值只能起部分的作用，不可能起决定的作用。有些同志把法币伪币跌价认为主要是我们对敌货币斗争胜利的结果，以为我们可以一下子把法币伪币斗垮，这样的认识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。

在停用法币伪币以后，根据地和敌占区仍然不能没有贸易来往。这种贸易既然再不能用法币来作桥梁，我们为着掌握主动权，必须授权我们的银行兑换法币伪币，合理规定抗币同法币伪币的比价。有些地区曾有一个时期拒绝收兑伪币，甚至没收伪币当众焚毁，这样就把抗币和伪币的交易逐入黑市，被敌伪和投机商人操纵，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。有些地区不根据这三种货币所表现的物价高低来合理规定比价，过多地压低法币伪币的比价，结果阻碍山货土产等的输出，引起贸易的入超，法币伪币供不应求，市场上法币伪币的比价就自然上升，我们在货币斗争中也就从主动变为被动。

在这方面我们曾有两次很生动的经验：头一次是1943年秋冬，我们的货币斗争取得巨大的胜利，法币的比价迅速跌落。有许多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，主张“乘胜追击”，继续提高抗币的比价。实际上在法币退出市场以后，市场货币流通数量严重不足，物价自然下落，需要迅速增发抗币，收购物资，保障根据地物价的稳定。他们不这样干，反而把自己手里的物资抛售出去。结果市场上货币的流通数量更少，物价跌落更快，许多经济单位特别是新发展起来的供销合作社经营亏本，甚至破产倒闭。而且由于我们没有利用秋后有利时机收购大量农产品，用来支持抗币，结果到来年春夏就没有充分的物资来阻止物价的回升。

另一次是在日本投降以后，由于敌人大量抛售库存物资，准备逃跑，敌占城市的物价曾经突然下落，伪币的比价回升，抗币的比价下落。有许多同志对此现象惊惶失措，大呼“抗日战争胜利了，货币斗争失败了”。我们的领导机关立即召开会议，指出根据地的物价是稳定的，没有受敌区物价暴涨暴落的影响，我们的货币斗争没有失败，而是胜利。这时敌占城市物价下落，伪币回升，我们正好利用时机，动员新解放区人民迅速用大量的伪币到敌占城市去抢购物资，伪币币值愈高，我们换回的物资愈多。伪币的回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，好景不常，不久便要变成废纸。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，向敌占城市抢购到大量的物资，所以又打了一个胜仗。

第四，在抗币同法币伪币脱离关系以后，如何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？许多同志被“金本位”、“银本位”旧观念束缚着，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，纸币离开了金银，币值就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。其实问题非常简单，币值的客观标准就看物价是否稳定。物价上涨就是币值跌落，物价下降就是币值上升，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常识。抗日民主政府编制物价指数，以此来检查币值的涨落，并以此为标准来调节货币的发行数量，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的稳定。

在市场上流通的是不兑现的纸币时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早已阐明货币流通数量必须符合流通需要的规律。他在《政治经济学

批判》中也曾指出，在实行纸币制度以后，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。如果货币的流通数量（发行数量）超过市场流通需要，币值就要下落。假定其他条件不变，货币的发行数量增加一倍，币值就跌落一半，具体表现就是物价普遍上涨一倍。这个规律，在抗日战争时期证明是完全正确的。1947年在邯郸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会议，我们计算各解放区虽然货币发行数量多少不同，物价高低不同，但每一个解放区人民的平均货币流通数量，都大体上等于三十斤粮食（约合现在人民币三元）。如果货币发行数量增加一倍，粮价也跟着上涨一倍，每人平均发行数量仍然是三十斤粮食。

货币的流通需要不是固定不变。首先，当时战争不断进行，解放区时常在扩大或缩小（敌人扫荡时候），抗币的流通范围因此也常发生变化。其次，在农村中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货币流通需要影响很大，旺季（秋冬）和淡季（春夏）货币的流通需要多少不同。但这些变化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经济工作者是不难掌握的。我们在秋收以后增发货币，大量收购各种农产品，以防止物价下落。到春荒时期适应市场需要吐出库存的物资，防止物价上升。投放和回笼的数量，以保持物价稳定的标准。开始时有些地区不懂得这个客观规律，在秋收以后缩手缩脚，不敢大量投放货币，结果到来年春季就没有物资来防止物价的上涨。

第五，我们对敌货币斗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同敌人争夺物资。过去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法币伪币，用来掠夺我们根据地的物资，转嫁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，在我们货币斗争胜利以前（1941年和1942年），每年向根据地流入几千万至几万亿元法币。同时就有同等价值的物资滚滚外流，比几次大扫荡的损失更大。在我货币斗争胜利以后，1943年我们把几亿元法币排挤出去，1945年又把几十亿元伪币从新解放区排挤出去，换回来同等价值的敌区物资，这对我根据地军需民用的供应无疑地是起重大作用的。

当时敌人在华北、华东、华中等地占领着几乎所有城市和比较大的集镇，掌握着几乎所有的工厂和金融贸易机关，他们的经济力量比我们大几十倍。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力量也远远超过我们，且有美国英国做他们的后盾。按此推断，法币伪币的信用一定远远超过抗币。可是事实与此相反，不但根据地的人民拒绝法币伪币，游击区的人民也乐于使用抗币，甚至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愿意接受抗币。为什么？主要原因是抗币的币值远较法币伪币稳定。法币伪币不断跌价，谁都不敢贮存。相形之下，只有贮存抗币最有保证，所以大家愿意抛出法币伪币来换取抗币。

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发明“劣币驱逐良币”规律。在市场上使用金属货币，劣币（含金量不足的货币）与良币等价流通时，良币会自动退出市场，被人贮藏起来。如果市场上流通的是不兑现的纸币，各种纸币按照不同的比价流通，那么情况就会相反，不是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而是“良币驱逐劣币”（不断贬值的纸币）。五十年代在美元远较其他货币巩固时，它曾象洪水一样涌向欧洲和其他各地市场。但到七十年代初期美元贬值时，各国资产阶级就抛售美元，抢购币值比较稳定的西德马克和日元。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抗币驱逐法币伪币，没有什么奇怪，是完全合于客观规律的。

现在美国仍在用通货膨胀来掠夺各国人民，他们抛出成千亿美元的纸币和短期债券，向欧洲、亚洲和其它地区投资、贷款，掠夺物资，并向他们转嫁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。非洲和其它地区有些新独立的国家还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，仍让美元、英镑、法郎等在自己的市场上流通；或者虽然发行自己的货币，但同这些外国货币保持固定的联系，以致外国货币仍在自己市场上占优势地位，不能不忍受外国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。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，对这些国家还有现实意义。对于今天我国学术界（下转第 I -54 页）

影响。因此，建议在基层社建立社务委员会，作为行政集体领导机构。同时，实行职工参加管理和社员群众参加监督的制度。

要普遍建立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。职工代表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，每届任期一年，一般每季召开一次职工代表会议，讨论企业的有关重大问题。例如：讨论通过购销计划，审查财务开支和各项基金的使用，监督企业领导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，端正经营作风，提合理化建议等等。

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务委员会。根据基层社规模大小由5~9人组成，并在其中推选出正副主任（有条件的基层社，也可以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）。社务委员会的正副主任，就是基层社的正副主任。基层社购销业务中的重要问题，由社务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
门市部、供销分店的正副主任（经理、组长），由本店、组职工直接选举产生。从宜昌县今年在50个单位试行的情况看，原有54个负责人，当选的有56人。其中，连任的40人，占71.4%；新选上的16人，占28.6%。落选的14人，占原有负责人总数的25.9%。新当选的干部，基本上是业务熟悉，有干劲、有能力、群众信得过的。他们的作法是放手发动群众，充分酝酿，无记名投票选举。有的地方还邀请社员代表和双代员参加，也取得了较好效果。但在个别单位，由于思想工作没跟上，组织方法不当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如有个别新选上来的人不愿干，个别落选人思想不太通。但从总的情况看，通过民主选举大大调动了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，就是连任的干部，通过选举也受到了教育，工作有新的起色。如土门供销社有一名多年担任门市部主任的同志，熟悉业务，有干劲，身体好，一贯表现积极，但工作方法简单，对人态度生硬，这次选举时，在15票中他只得8票。选举结果对他触动很大，当宣布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时，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，表示了搞好工作的决心。近几个月来，他的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，职工群众和基层社的领导都非常满意。

（3）社员群众对供销社实行监督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这个县的基层社也普遍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，搞得好的地方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和破坏，有的流于形式。基层社的同志认为坚持群众路线，实行民主办社，是供销社的好传统，不能丢掉。多数同志要求把社员群众监督的办法恢复起来，在基层供销社建立社员代表会议的制度。就是在基层社服务范围内，以大队为单位由社员群众推荐社员代表，每年召开一至二次会议。由基层社主任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，请社员代表评论供销社的工作，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。

（1979年12月）

（上接第 I-62 页）在货币问题上的争论（如要不要实行金本位），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附记：这篇文章，是我把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两篇论文，于1974年合并改写而成。因《财贸经济》丛刊索稿很急，故用旧稿顶替。文中提到在1945年日本抗降时候，有位美国记者看到山东解放区“北海银行”纸币，币值远远高于法币伪钞，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。他来找我详谈了四小时，我向他说明可以用控制纸币流通数量来保持币值稳定的原理，他认为这是货币学说史的一个新的发明（其实马克思早已说过），并问我美国能否实行这种政策。我说现在美国掌握世界黄金贮存量的半数以上，可以继续实行金本位制。最近访美，与一位美国教授谈及往事，教授笑着说：“现在美元也已经脱离黄金，采取你的货币学说了。”因此我想到此稿仍有现实意义，可以发表供同志们作参考。

1979年12月